



## 汉语教学方法的历史演进与范式转型

### ——基于 Nvivo14 的质性研究

##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Paradigm Shifting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Methods

### ——A Qualitative Study Based on Nvivo14

张贵珍<sup>1</sup>

SIRIRIN SAECHANG

华侨崇圣大学、中国学院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Huachiew Chalemprakit University

sirin8888@gmail.com

李寅生<sup>2</sup>

LI YINSHENG

广西大学、文学院

School of Literature, Guangxi University, China

lys31199@126.com

Received: 16 May 2025 / Revised: 2 October 2025 / Accepted: 17 December 2025

## 摘要

本文基于 340 篇文献的 Nvivo14 质性分析，构建结构导向、功能交际、技术融合三维度，揭示汉语教学“功能主导-技术崛起-结构补充”的历时格局。研究梳理四阶段演进：结构主义（50-70 年代）、功能转向（80-90 年代）、任务型扩张（90-21 世纪初）、智能技术驱动（2010 后），结合历史规律与技术革命，提出智能时代新范式，为国际中文教育体系创新提供理论参照。

**关键词：**汉语教学方法；NVivo14；历史演进；范式转型

## ABSTRACT

Based on the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340 documents using Nvivo14,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three-dimensional model of structural orientation, func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integration, and reveals the historical pattern of "function-dominance-technology-emergence-structural-

complement" in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The sorts out the evolution of the four stages: structuralism (1950s-1970s), functional turn (1980s-190s), task-based expansion (1990s-early 21st century), intelligent technology-driven (after 2010), and a new paradigm for the intelligent era by combining historical laws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providing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innov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system.

**Keywords:**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methods NVivo14; historical evolution; paradigm transformation.

## 绪论

### (一) 研究背景

全球化浪潮中的语言版图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重构，汉语作为承载五千年文明基因的符号系统，其教学实践已突破单纯的语言技能传授范畴，演变为跨文明对话的桥梁工程。人工智能技术重塑教育生态、多元文化碰撞重构学习场景的今天，语言教学正面临本体论与方法论的双重挑战：传统的知识传输模式如何对接深度学习时代的认知规律？技术工具的应用如何避免陷入“技术至上”的迷思？对这些根本性问题的回应，要求我们以考古学式的严谨回望教学方法演进的内在逻辑，以现象学式的敏锐捕捉教学现场的复杂肌理，在历史纵深与现实需求的张力中，重构具有文明对话价值的汉语教学新范式。

### (二) 研究的主要内容、方法和意义

#### 1. 研究内容

第一，本文基于 Nvivo14 对 340 篇汉语教学文献的质性编码分析，对汉语教学的复合型格局进行历时分析，追溯汉语教学方法的外显形态变迁。

第二，在汉语教学范式的历史演进基础上，通过解构转型动因的复杂性，为理解语言教育范式的“变”与“不变”提供了更具解释力的理论透镜，也为应对数字时代汉语教学的伦理性与实效性冲突指明了批判性反思路径。

第三，结合历史规律与技术革命逻辑，研究提出未来汉语教学将向“智能生态范式”演进，对技术驱动下的汉语教学新范式展望。

#### 2. 研究方法

(1) 文献研究法：整理国内外相关文献，梳理汉语教学方法的历史脉络，分析传统方法的理论基础，构建汉语教学方法理论框架，支撑批判性反思与创新方向论证。

(2) 扎根理论法：本文采用扎根理论方法构建汉语教学理论体系，通过系统性文本分析采集 340 篇文献、政策文件及教学案例报告等质性数据。基于 Nvivo14 软件实施三级编码：首先进行开放式

编码, 逐句提取初始概念; 继而通过主轴编码建立概念间逻辑关联, 形成子范畴; 最终经选择性编码凝练出结构导向、功能交际与技术融合三大核心范畴。研究同步生成可视化分析图谱: 词云图凸显高频主题词, 编码节点网络图揭示各范畴间的共生与迭代关系, 时间轴分析展现教学方法与改革开放、教育信息化等社会进程的动态耦合。通过解构不同时期关键文本中“语言规划政策”“技术基础设施”“国际中文需求”等社会文化要素, 揭示结构主义教学受苏联语言学影响、交际法转型契合对外开放战略、技术融合创新响应教育数字化等深层动因, 最终形成兼具历史纵深与文化解释力的本土化汉语教学理论框架。

(3) 课堂观察法: 通过系统观察真实教学场景中的师生互动、课堂实践及创新方法的应用效果, 观察传统教学方法与新兴方法在课堂中的实际表现, 分析其优缺点及学生反馈, 为回溯教学传统、验证创新有效性提供实证依据, 从而推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 (三) 研究意义

理论意义: 本文融合语言学、教育学等多学科理论, 探讨汉语教学如何平衡文化传承与创新, 运用扎根理论生成的范畴可解释汉语教学方法变革的动力来源, 突破传统研究对“方法有效性”的单一归因, 构建汉语教学方法的理论框架, 揭示历史演进规律与范式转型机制, 提出“智能技术驱动的新范式”假设。

实践意义: (1) 通过对比传统与创新方法的课堂实效, 为教师提供“因材施教”的依据, 助力汉语国际教育在守正与变革中持续发展。(2) 针对智能技术崛起趋势, 研究结论可为教育机构开发虚拟现实(VR)沉浸式教学、自适应学习平台等新型工具提供参考, 促进汉语教学从“教师中心”向“技术赋能”转型, 提升教学效率与个性化水平。

### (四) 研究现状

近年来, 汉语教学方法研究呈现“传统回视深化”与“创新路径多元化”并行的趋势, 但仍存在理论体系断层、实践适配不足等问题。

首先, 传统方法的延续性研究方面。学界对汉语教学传统方法(如语法翻译法、直接法、听说法)的反思集中于文化传承价值与现代适应性的张力。例如, 崔永华(2020)提出“对外汉语教学目标是培养汉语跨文化交际能力”<sup>1</sup>刘珣(2019)则呼吁警惕“后教学法时代对汉语二语教学有害无益”。<sup>2</sup>其次, 创新方法的实践探索方面。任务型教学法(TBLT)、内容与语言融合教学法(CLIL)的应用研究较多, 但多聚焦单一方法效果验证(如李泉, 2020)<sup>3</sup>。混合式教学、智慧课堂等新技术模式兴起(如慕课、AI互动平台), 但存在“技术表层化应用”问题(王建勤, 2018)<sup>4</sup>。最后, 跨学科方法论整合方面。认知语言学、二语习得理论与汉语教学的结合逐渐增多(如“字本位”理论

<sup>1</sup> 崔永华. 对外汉语教学的目标是培养汉语跨文化交际能力[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20, (04): 25-36.

<sup>2</sup> 刘珣. 紧随共和国前进的步伐成长的学科[J]. 国际汉语教学研究, 2019, (04): 16-17.

<sup>3</sup> 李泉, 陈天琦. 论新时代对外汉语教学的“大学科化”之路[J]. 语言文字应用, 2020, (02): 79-88.

<sup>4</sup> 王建勤. 语言生活视角下的汉语国际教育[J]. 语言战略研究, 2018, 3(06): 17-24.



(王洋, 2023)<sup>5</sup>与认知负荷理论(施仁娟, 2012)<sup>6</sup>的嫁接), 但本土化理论框架尚未成熟。

综上, 当前研究在传统方法的文化价值挖掘、技术创新工具开发上取得进展, 但尚未形成贯通历史脉络、技术逻辑与文化内核的系统理论, 且实践层面缺乏可复制的跨文化适配方案。未来研究需在方法论整合、技术人文协同等维度寻求突破, 这正是本文的核心研究价值所在。

一、研究设计

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 运用 Nvivo 软件对汉语教学方法相关主题进行检索和编码, 运用扎根理论对汉语教学方法的相关文件进行解读。在文献检索过程中, 以“汉语课堂管理效果”“汉语教学方法”“留学生汉语”和“教学法”等相似主题词对 1949 至 2024 年间的文本进行查询, 文献筛选来源于 CSSCI 来源期刊、北大核心期刊, 从中精选出了 338 篇文献作为本文的研究样本, 另外, 在“北大法宝”和政策网也进行了相关文本的检索并选取了 2 篇。最后, 筛选出与本文相关性较强的 340 篇文本进行质性分析。如表 1。

本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 第一是汉语教学方法呈现了怎样的历史演进脉络与阶段性特征? 第二是推动其范式转型的关键动因与内在机制是什么? 第三是智能时代背景下汉语教学的新范式与发展路径如何?

表 1 汉语课堂管理效果文本示例 (前 10 位)

序号	文本名称	年份	文本主体
1	新世纪对外汉语语法教学研究回顾与思考	2022	对外汉语研究
2	世界少儿汉语教学研究: 回顾与展望	2020	汉语学习
3	新时代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取向与问题	2020	语言教学与研究
4	语块教学法对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介词习得的影响	2023	语言教学与研究
5	“产出导向法”在海外本土汉语师资教学法课程中的应用	2021	外语教育研究前沿
6	交际策略教学法研究	2011	语言教学与研究
7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脚手架”教学法初探	2009	世界汉语教学
8	交际式教学法在汉语口语课堂教学中的运用	2006	语言文字应用
9	搭建语言互通之桥 加强文明互信互鉴——习近平主席致 2024 世界中文大会的贺信为开展好国际中文教育凝聚共识	2014	新华社
10	教育部关于印发第二次全国对外汉语教学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	2000	教外专

<sup>5</sup> 王洋,张琦.基于字本位理论的国家通用语教学模式构建与实践探索[J].语言与翻译,2023,(02):75-80.

<sup>6</sup> 施仁娟.认知负荷理论及其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2,31(11):40-42.

## 二、文本编码过程

通过对所选文本内容的相关性编码,能够有效梳理出文本内容的主次层级关系,从而精准提取出与主题相关性较强的词汇。本文通过对 340 篇文本内容进行可视化分析和编码,从中汇总出了影响汉语课堂管理效果的高频词汇。

### （一）可视化词云图

通过运用 Nvivo14 工具对所选的 340 篇文本进行可视化分析,得到了可视化词云图,这不仅对后续子节点的分析汇总有帮助,而且对本文的研究也起到了重要的基础作用。将 340 篇文本导入后,先对每篇文本进行了自动编码识别出主题,从而得出每篇文本的编码值及参考点。所有文本完成编码后,开始采用可视化词云分析,通过查询功能新建查询,选择数据来源并设置最小长度为 2,将字词最常见的出现频率调整为 100,之后运行查询,对于查询结果中不需要的词语添加到停用词列表,再次运行查询后得出如图 1 所示的可视化词云图。该词云图提取出了文本中出现次数最多的词语,影响文本的核心要素显而易见。另外,在查询结果的右侧汇总处删除长度数值列表,能够得出表 2 中的前 20 位高频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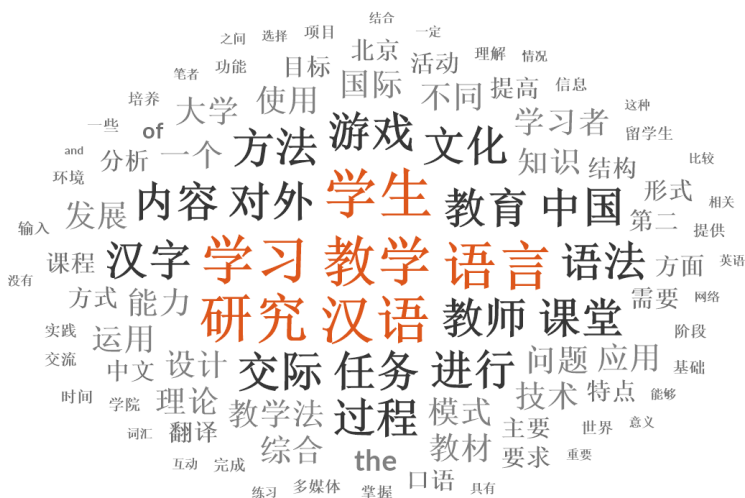


图 1 可视化词云图

图1可视化词云图中的字体大小与词语出现的频率属于正相关的关系,并且字体越大,说明与主题词的相关性越强。通过对比图1的可视化词云图可以发现“教学”“汉语”“学生”“语言”“学习”和“研究”这几个词语的字体较大,也即出现的频率较高,它们的加权百分比分别为3.10%、2.25%、1.36%、1.26%、1.08%和0.70%。这表明所选的文本内容与“汉语教学方法”这一主题契合度较高。另外,“教师”“教育”“对外”“任务”和“交际”的计数也很高,同样说明了它们在汉语教学方法中的影响力较高。因此,将这些词汇概括为影响汉语教学方法的主要因素是有说服力的。





表 2 为可视化词汇查询汇总表前二十位，最低计数为 712，加权百分比为 0.29%，表明所选文件与主题搜索词关系较为紧密，符合本研究。

表 2 可视化词汇查询汇总表（前 20 位）

序号	单词	计数	加权百分比（%）	序号	单词	计数	加权百分比（%）
1	教学	6399	3.10	11	进行	1002	0.45
2	汉语	5043	2.25	12	交际	995	0.44
3	学生	3052	1.36	13	文化	990	0.44
4	语言	2715	1.26	14	游戏	955	0.43
5	学习	2412	1.08	15	方法	813	0.36
6	研究	1560	0.70	16	课堂	807	0.36
7	教师	1419	0.63	17	语法	792	0.35
8	教育	1304	0.58	18	中国	768	0.34
9	对外	1228	0.55	19	内容	721	0.32
10	任务	1020	0.46	20	学校	712	0.29

(二)  
本  
文  
内  
容  
编  
码  
分  
析

为更加客观归纳出汉语教学方法参考点，本文对 340 篇文本内容进行手动编码。首先通读所有文本内容，对于出现频率高的影响因子已经大致知晓，在此基础上新建节点并命名，再对文本内容进行逐篇编码，找出与主题相关性较强的子节点，然后将同一纬度的多个子节点组织到一个父节点中，最终得到表 3，例如，本文的听说法、认知法等都是结构导向型维度下的子节点。经过对 340 篇文本的整体阅读，最终整理出 10 个子节点，将所有子节点归纳总结出了结构导向型、功能交际型和技术融合型三个维度父节点。

表 3 汉语教学方法文本分析的二维分布统计

父节点	数值	子节点	数值
结构导向型	101	语法翻译法	45
		听说法	34
		认知法	22
功能交际型	132	交际教学法	44
技术融合型	107	任务型教学法	34
		沉浸式教学法	54
		多媒体辅助教学	41
		移动端语言应用	21
		虚拟现实（VR）教学	28
		大数据驱动教学	17

由上表可知，第一，功能交际型（132）数值最高，表明已有研究中汉语教学更注重语言的实际运用能力。沉浸式教学法（54）是功能交际型中占比最高的方法，反映学界对真实语境中语言习得的高度重视。任务型教学法（34）数值相对较低，可能因其对教师设计任务的能力要求较高，推广难度较大。第二是技术融合型（107）紧随其后，显示技术手段在汉语教学中逐步普及，但尚未超越功能交际型。多媒体辅助教学（41）占据主导，因其成本低、易操作，仍是技术应用的基础形式。VR 教学（28）和移动端应用（21）处于发展阶段，未来潜力较大；大数据驱动（17）应用较少，可能受数据隐私和技术门槛限制。第三是结构导向型（101）数值最低，但仍有稳定占比，表明传统方法（如语法翻译法）在基础教学中仍有一席之地，语法翻译法（45）占比最高，可能用于语法体系讲解或应试教学；听说法（34）侧重机械训练，适用短期强化；认知法（22）因理论抽象，实践难度较大。综上数据表明，汉语教学已形成“功能交际为主，技术融合崛起，结构导向补充”的多元格局，未来需进一步优化方法整合，平衡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技术应用。

### 三、编码结果分析

为系统揭示汉语教学范式的历时性转型，本文基于 340 篇核心文本的计量分析，将二十世纪中叶至 2020 年代划分为四个关键时期：20 世纪 50-70 年代、20 世纪 80-90 年代、20 世纪 90 年代-21 世纪初及 2010 年至今。通过对教学理念与技术工具协同进化路径的文本解构，试图为国际中文教育的范式创新提供历时性参照坐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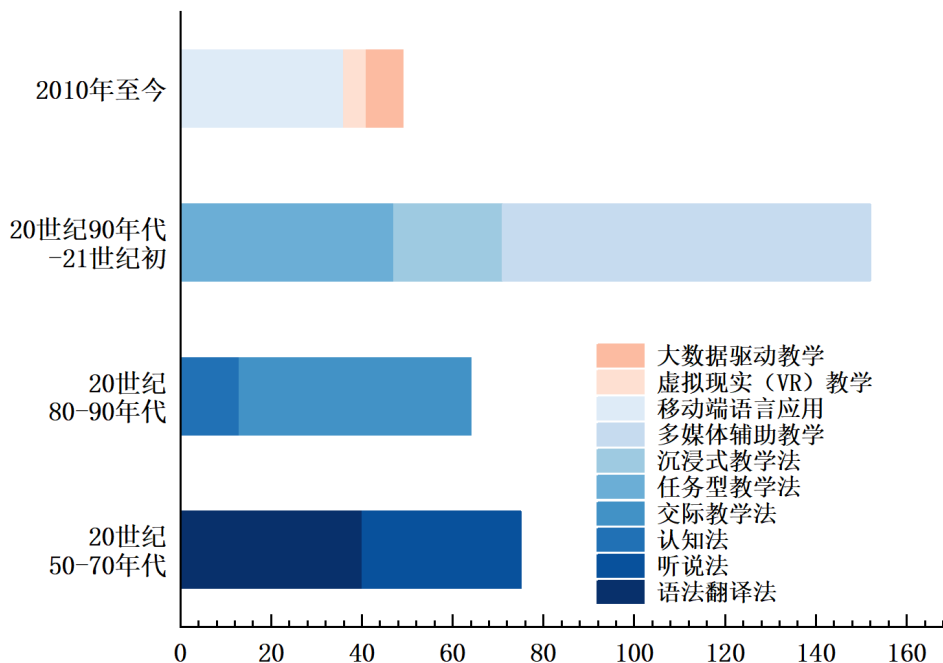


图 2 汉语教学方法分时段文本统计 (1949-2024)

根据上表可知各时期主导方法的演变。首先是 20 世纪 50-70 年代，语法翻译法（40）和听说法（35）占据主导，体现早期以语言结构和机械训练为核心的教学模式。主要是受传统语言学和行为主义心理学影响，强调语法规则与句型操练，适合基础教学和短期强化。其次是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交际教学法（51）成为主流，数值远超认知法（13），反映教学重心向实际交际能力转移。主要是受社会语言学理论推动，课堂设计更注重真实语境中的互动，符合全球化对语言实用性的需求。再次是 20 世纪 90 年代-21 世纪初的多媒体辅助教学（81）数值最高，显示技术开始融入教学，但任务型（47）和沉浸式（24）方法的兴起表明“任务驱动”和“语境沉浸”成为新方向。多媒体技术（如课件、视频）的普及降低了教学成本，但沉浸式方法因资源限制推广较慢。最后是 2010 年至今多媒体辅助教学（36）数值下降，但仍占一定比重，移动端应用（5）和 VR 教学（8）初步应用，表明技术进一步向移动化和场景化发展。大数据驱动教学（8）虽数值低，但作为新兴方向，潜力显著。

## 四、研究结论

### （一）20 世纪 50-70 年代：苏联模式本土化与结构法主导

新中国成立初期，教育领域全面推行“苏联化”改革，汉语教学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理论框架，形成以语法训练为核心的“语言工具论”范式。这一时期的教学服务于国家建设需求，教材编写与政治宣传深度绑定，如直接选用《毛泽东选集》作为阅读材料，将语言学习与意识形态传播相结合。

教学方法呈现双轨制：一是语法翻译法，通过母语（俄语）与汉语的逐词对译和语法规则讲解，侧重培养读写能力，课堂以语法分析、翻译练习和句型背诵为主；二是结构主义教学法，以 1958 年《汉语教科书》为标志，将语言结构分解为可操练的句型单位，形成“语法点讲解→替换练习→情景对话生成”的三段式教学模式。周祖谟（1953）首次系统提出汉语二语教学原则，主张语法规则与翻译法结合构建语言基础；《汉语教科书》编写组（1958）则确立“实践语法”框架，推动结构法本土化。

苏联模式的结构法通过系统化语法训练，短期内快速构建语言框架，契合国家强化教育的需求。但其工具理性导向削弱了语言的人文性和实用性，教材的政治化虽强化意识形态统一，却限制了文化多样性与交际能力培养。这一阶段既为汉语教学积累了本土化经验，也暴露了单一教学法的局限性，为 80 年代交际法转型埋下伏笔。

### （二）20 世纪 80-90 年代：功能法与学科体系化

汉语教学在全面效仿苏联教育模式的框架下，完成了从传统人文教育向工具化语言训练的范式转型。这一阶段的教学体系以“语言工具论”为哲学基底，通过语法翻译法与结构主义教学法的双重路径构建方法论框架。周祖谟（1953）在《汉语教学法问题》中首次系统论证了语法中心主义的



科学性，其理论被具象化为《汉语教科书》（1958）的句型机械操练模式。教材编写呈现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如通过《毛泽东选集》选读实现语言学习与政治教育的符号缝合。该范式虽依托系统化语法规则实现了语言结构的快速习得，但其过度依赖母语中介的逐词对应机制，导致学习者陷入“形式-意义割裂”的认知困境。刘月华（1979）的批判性研究揭示，这种工具理性导向的教学不仅催生出“哑巴汉语”的交际能力缺陷，更因教材内容的政治化倾向削弱了语言的实际交际价值。

这一时期的汉语教学范式是冷战地缘政治与社会主义教育现代化工程的复合产物，其历史意义需置于双重维度考察。一方面，以语法为中心的工具化路径契合了国家快速培养外语人才的战略需求，其结构化教学体系为汉语学科建设奠定了早期方法论基础；另一方面，福柯所指的“知识-权力”规训机制在此得到充分映射——教材的政治话语植入实质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语言教育场的殖民。从语言学理论演进视角看，该范式受苏联结构主义语言学影响，将语言简化为可拆解的符号系统，虽在短期内提升语法认知效率，却因忽视语用功能而背离了语言作为社会交往媒介的本质属性。刘月华的批判标志着汉语教学界对工具理性的首次系统性反思，其提出的“形式-意义整合”命题直接推动了 1980 年代交际教学法的范式革命。值得深入探讨的是，这种高度政治化的教育模式如何通过“红色话语”的编码-解码机制重构了汉语的国际认知图景，其历史遗产至今仍潜藏于汉语国际传播的深层叙事结构中。

### （三）20 世纪 90 年代-21 世纪初：任务型教学与标准化扩张

在全球化进程加速与国家汉语国际推广战略的双重驱动下，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领域呈现出显著的标准化转向。这一时期的标志性特征是任务型教学法的系统化应用与标准化评估体系的全面建构。研究者普遍关注到（国家汉办，2008），《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确立的“语言知识、技能策略、文化意识、情感态度、学习策略”五维能力标准，为全球汉语教学提供了统一框架。崔永华（2008）通过构建任务型教学的操作模型，将语言训练从传统的结构操练转向交际功能实现，典型代表如《汉语会话 301 句》通过情境化任务设计实现语言能力整合培养。技术赋能方面，语音实验室与多媒体课件的普及推动教学工具理性化发展，而 HSK 考试的标准化改革（旧版至新版）则强化了测评体系的指标导向。值得注意的是，美国 ACTFL 标准的本土化尝试催生了高校沉浸式汉语项目的兴起，但吴应辉（2010）<sup>7</sup>等学者尖锐指出，这种标准化范式存在文化适配困境，特别是在东南亚和非洲地区，“一刀切”的课程体系与当地教育传统产生显著张力。

该时期的标准化探索在提升汉语国际教育效率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特别是任务型教学法通过“做中学”的理念突破，有效解决了传统语法翻译法的交际能力培养短板。国家汉办的标准化框架为全球汉语师资培训提供了可操作的基准线，其量化评估体系对教学质量的监控具有积极意义。然而，这种强标准化导向也暗含工具理性对文化主体的消解风险：一方面，语音实验室等技术工具的使用虽然提高了发音训练效率，但过度依赖可能弱化师生的人际互动价值；另一方面，HSK 考试主导的应试取向导致部分教学机构陷入“考什么教什么”的功利循环。吴应辉指出的文化适配问题尤

<sup>7</sup> 吴应辉.国际汉语教学学科建设及汉语国际传播研究探讨[J].语言文字应用,2010,(03):35-42.

为关键，标准化课程在非汉字文化圈的实施效果往往受制于文字系统差异和学习动机分化。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标准化框架的弹性边界，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教育技术背景下，如何通过自适应学习系统实现标准化与个性化的动态平衡，或将成为破解该领域结构性矛盾的新路径。

#### (四) 2010 年至今：技术赋能与范式重构

这一时期，在数字技术革命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双重驱动下，汉语国际教育正经历由工具理性向智能生态的范式跃迁。郑艳群（2017）在《汉语教育技术研究的新进展与新认识》中系统解构了智能技术的教育应用场景，提出混合式教学框架通过“数字孪生”（Digital Twin）机制实现物理课堂与虚拟空间的拓扑叠合——如“汉语桥”全球赛事与 Coursera 慕课的协同，本质上是布迪厄“文化资本”在赛博空间的再分配实践。<sup>8</sup>李宇明（2020）倡导的“大汉语国际教育”概念，将语言教学扩展为跨文明对话的量子纠缠系统，其核心在于利用 AI 自适应算法（如 LingoChamp 的神经机器翻译引擎）破解二语习得的“维果茨基悖论”（即社会文化互动与个体认知发展的非线性关系）。技术伦理层面，元宇宙课堂通过 VR/AR 构建的超模态交互场域，虽能模拟胡同讨价还价等言语行为事件（speech event）<sup>9</sup>，但陆俭明（2025）揭示出此类技术存在“文化能指漂浮”风险——故宫虚拟游览中建筑符号与历史语境的脱嵌即明证。当前学界构建的“语言—文化—策略”三维评估模型，实质是试图用量子叠加态描述学习者的跨文化能力生成机制。<sup>10</sup>

这一时期是教育智能化转型驱动下的汉语国际传播正经历着从传统国家叙事工具向数字文明基座的结构性跃迁，其范式革命不仅实现了教学场景从实体课堂向元宇宙空间的时空跨越，更关键的是通过区块链赋能的分布式知识网络，重构了文化传播的权力拓扑结构。在深度神经网络支撑的多模态学习生态中，“教育公平”的内涵已超越物理终端的普及性接入，演化为协同框架下的文化解释权博弈——智能算法作为新型文化转译者。既需要突破传统中心化话语体系的编码惯性，又要通过联邦学习机制实现跨文明语料库的动态协商。这种技术哲学层面的范式转换，实质上是在数字孪生语境中重建中华文明的话语生成范式，使汉语传播从单向度的意义输出转变为全球知识共同体参与的价值共创过程。

总的来说，1949 年以来，汉语教学方法历经政治化到学科化再到技术化转型，面临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双重张力。未来需融合神经认知科学、数字人文与跨文化交际理论，构建“以人为本”的智能教学范式，方能在文明互鉴中实现可持续发展。

## 五、展望

随着全球汉语学习需求的持续增长及教育技术的革新，汉语教学方法正面临系统性变革。基于历史演进规律与当代技术革命的双重逻辑，探讨汉语教学发展的新范式，以期为国际中文教育体系的完善提供理论参照。

<sup>8</sup> 郑艳群.汉语教育技术研究的新进展与新认识[J].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17,(04):60-67.

<sup>9</sup> 李宇明.数据时代与语言产业[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65(05):87-98.

<sup>10</sup> 陆俭明.大语言模型的“语言”跟自然语言性质迥然不同[J].语言战略研究,2025,10(01):1.

### (一) 智能技术驱动下的教学模态重构

从立足汉语教学的创新与发展出发,着力改变一切与汉语国际教育相关的汉语学习方式与文化传播方式,这强烈预示随着中华文化“走出去”,正在孕育着一场里程碑式的汉语教育变革,从而最终实现汉语从“数字校园”走向“数字城市”“数字国家”乃至“数字地球”。<sup>11</sup>智能技术驱动下的汉语教学模态重构,标志着语言教育范式从传统单向传授向智能化、精准化、沉浸化的系统性转型。重构过程以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及神经科学技术的深度整合为核心,通过“数据-算法-认知”三元驱动机制重构教学全流程。自适应学习路径的精准生成、人机协同的教学决策机制、低成本轻量化技术的普及方案等智能生态范式的落地路径探索。这种重构本质上契合二语习得的神经可塑性规律,突破时空限制实现教育资源的全球共享,通过技术赋能的沉浸体验达成语言能力建构与文化认同培育的协同发展,为构建人机共生的智慧教育生态奠定理论基础。

### (二) 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教学范式转型

在全球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汉语教学已从单纯的语言技能培养转向更深层的文化能力建构。数字技术重新定义了文化传播的时间效能,使文化传播的时效具备了全新意义上的即时性、碎片性和恒定性,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更为强大的传播效能。<sup>12</sup>时代转型的核心在于突破传统的“文化知识灌输”模式,构建以跨文化交际能力为导向的动态教学体系。要求汉语教师角色的根本转变,从“文化权威”到“文化导航员”。主要体现为汉语教师应具备三重能力:文化现象的“解域化”解读能力,跨文化对话的脚手架搭建能力,数字原住民文化的话语转换能力。这种范式转型不仅关乎教学方法的进步,更是对全球化时代文化对话新格局的主动回应。未来的汉语文化教学应致力于培养具有“文化第三空间”构建能力的全球公民,使语言学习者成为不同文明间可持续对话的桥梁建造者。在这个过程中,开发争议性文化议题的讨论模块、构建文化符号的沉浸式解构场景、推动“学习者作为文化创作者”将成为持续探索的重要课题。

### (三) 多元协同生态下的教学共同体构建

“外语+专业”教学共同体是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关键生态因子,通过跨学科协作教学创新形成外语和专业教育共生共赢、可持续发展的教育生态系统,有助于教师从全局性视角探索教育问题,提出更具前瞻性和创新性的教育理念和做法。<sup>13</sup>同样,汉语教学范式演进正突破单一教育主体的线性模式,转向以“人本—技术—环境”多维互嵌为核心的生态化发展路径,建立“汉语教师—技术工程师—学科专家”的跨领域协作平台:定期开展需求对接会,共同研发真正贴合教学逻辑的智能工具与资源。教育主体从机构中心转向人机物多元共生,教学过程从预设性知识传递进化为涌现性意义协商,文化传播模式从中心辐射式升级为去中心化的生态网络。这种生态化转型重塑汉语教育的空间拓扑

<sup>11</sup> 徐娟,史艳岚.十年来数字化对外汉语教学发展综述[J].现代教育技术,2013,23(12):54-58.

<sup>12</sup> 李萌,王育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数字机制与趋势[J].人民论坛,2023,(02):104-106.

<sup>13</sup> 顾晓乐.教育生态视域下“外语+专业”跨学科教学共同体构建研究[J].外语界,2025,(01):73-80.





结构，更通过建立“数字-物理-文化”的三元融合机制，为破解语言教育中的文化折扣难题提供了新的实践框架，推动国际中文教育向更具韧性和包容性的方向演进。

## 结语


汉语教学法的演变史，本质是教育对“人如何习得语言”这一核心问题的持续回应。本研究通过质性分析揭示了汉语教学方法“功能主导-技术崛起-结构补充”的历时格局与演进机制，为智能时代新范式的构建提供了理论参照。然而，本研究亦存在三方面局限：首先，样本主要来源于中文学术期刊，对海外一线实践及多语种研究成果覆盖不足；其次，质性编码虽遵循扎根理论流程，但范畴归纳仍不可避免地受到研究者主观视角的影响；最后，对智能技术应用的伦理困境（如数据隐私与算法偏见）尚未展开充分讨论。这些局限为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未来可通过扩大样本范围、采用混合研究方法、深化技术伦理批判等路径加以完善与拓展。

面向未来，汉语教学法的创新需在守正与革新之间保持张力。一方面要扎根汉字文化特性，在智能技术应用中避免“技术至上主义”的陷阱；另一方面应构建动态适应机制，通过教师数字素养提升、多模态资源库建设和跨学科研究协同，推动教学法创新从“工具理性”向“文化赋能”的范式升级。随着“国际中文教育”概念的深化发展，教学法研究必将在中国话语体系构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发挥更重要的桥梁作用。

## 参考文献

- 吴应辉. 国际汉语教学学科建设及汉语国际传播研究探讨[J]. 语言文字应用, 2010, (03): 35-42.
- 施仁娟. 认知负荷理论及其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J].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2012, 31 (11): 40-42.
- 徐娟, 史艳岚. 十年来数字化对外汉语教学发展综述[J]. 现代教育技术, 2013, 23 (12): 54-58.
- 郑艳群. 汉语教育技术研究的新进展与新认识[J]. 国际汉语教学研究, 2017, (04): 60-67.
- 王建勤. 语言生活视角下的汉语国际教育[J]. 语言战略研究, 2018, 3 (06): 17-24.
- 刘珣. 紧随共和国前进的步伐成长的学科[J]. 国际汉语教学研究, 2019, (04): 16-17.
- 李宇明. 数据时代与语言产业[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65 (05): 87-98.
- 崔永华. 对外汉语教学的目标是培养汉语跨文化交际能力[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20, (04): 25-36.
- 李泉, 陈天琦. 论新时代对外汉语教学的“大学科化”之路[J]. 语言文字应用, 2020, (02): 79-88.
- 李萌, 王育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数字机制与趋势[J]. 人民论坛, 2023, (02): 104-106.
- 王洋, 张琦. 基于字本位理论的国家通用语教学模式构建与实践探索[J]. 语言与翻译, 2023, (02): 75-80.
- 李萌, 王育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数字机制与趋势[J]. 人民论坛, 2023, (02): 104-106.
- 陆俭明. 大语言模型的“语言”跟自然语言性质迥然不同[J]. 语言战略研究, 2025, 10 (01): 1.
- 顾晓乐. 教育生态视域下“外语+专业”跨学科教学共同体构建研究[J]. 外语界, 2025, (01): 73-80.

## Author (1) Information (第一作者信息)

	<b>Name and Surname (姓名) :</b> SIRIRIN SAECHANG
	<b>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 :</b> Doctoral Candidate
	<b>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 :</b> Huachiew Chalermprakiet University
	<b>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 :</b> TERCHING CHINESE
	<b>Address (地址) :</b> Huachiew Chalermprakiet University 18/18 Debartana Rd. km. 18 (Bangna-Trad) Bangplee Samutprakarn 10540

## Author (2) Information (第二作者信息)

	<b>Name and Surname (姓名) :</b> LI YINSHENG
	<b>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 :</b> Prof. Dr.
	<b>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 :</b> Guangxi University, P. R. China
	<b>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 :</b> CHINESE Philology
	<b>Address (地址) :</b> No.100, University East Road, Nanning City,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P. R. China



